

理论创新才是惟一的出路

□高建平

中国学术界围绕着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影响,有过一些争论。大体说来,人们持两种态度:一种是全盘接受,觉得西方人说的句句是真理。这些学者常这样写文章:开头是某位大师说了什么,然后是他再说了什么,他还说什么,他又说什么,最后,是他终于说了什么。文章到此结束。另一种态度是,中国文论本来就成体系,西方文论来了,中国人不说自己的话了,一味学语,最后把自己的东西全丢了。他们写起文章来,除了批国外文论外,就是呼吁回到古代文论。古代文论是在对古代文学的点评和论述中形成的,其根基在古代文学。时代变了,我们日常说话都不再“之乎者也”,而说现代汉语了,文学当然要变。于是,这后一种学者是在说着一些与我们当下的文学实践毫不相关的东西。前者是“西化”,接受普世主义价值观;后者是“中化”,寻找纯粹的中国性。这两种态度,都很有号召力,可以无限争论下去。事实情况是,这么一争,文论家们就吵得亦不亦乐乎,听众们也迅速跟进。有人立场鲜明,气势雄壮地选边站;有人在两者之间作各种各样廉价的折中,吵来吵去,学术好像是繁荣了,但结果是文论离开文学实践越来越远,越来越在术语的辨析里钻牛角尖。这时,又出现了一种说法:要研究“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或者干脆叫做“理论”。这种说法可能最初出自国外的某个书斋,是万千种外国学说中的一种而已,但传到中国,却仿佛找到了土壤,生根发芽,疯长起来,对文学理论园地的健康生态,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

文学理论与文学的关系,应该是毛与皮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文学,哪来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和欣赏实践,可以构成一个三角的关系。一方面,文学批评是对文学实践的反思,而文学理论是对文学批评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实践到批评,再到理论,构成三个层次。但另一方面,文学理论并不能满足于这种间接性,它又受文学创作和欣赏的实践启发,并对这种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由此,构成理论、批评和实践的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文学创作和欣赏的实践,应该是具有基础的地位。其他二者,都是依附在它之上产生的。

研究惟一健在的“九叶”诗人、诗歌理论家和翻译家郑敏的创作思想,对当代新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周礼红的新著《郑敏创作思想研究——兼及1940年代以降中国新诗发展动向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对新诗的发展进行了回顾与展望,也为新诗的研究提供一种新路径。

一、研究视角独特。作者将郑敏诗歌作品及其诗学理论作为一个典型个案进行全方位考察,通过分析郑敏创作思想如何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过程,折射出20世纪新诗发展的历程,试图为当代新诗的建设寻找一种有价值的启示。著作中以新诗的发展为主线,将郑敏的人生、诗歌、诗论和翻译融合在一起进行研究,认为郑敏1986年以前的创作思想基本是现代主义的,而1986年以后基本转向后现代主义;郑敏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思想先是受美国的当代诗歌和解构主义的影响,其后在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郑敏运用后现代主义思想提出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倡导当代女性诗歌应是超性别写作,主张新诗应是心灵的书写;郑敏创作思想的转变,反映了中国新诗从学习西方到回归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的历史性转变。

二、结构新颖。该著采用明线和暗线双线并进的结构,明线是微观的、具体的,暗线是宏观的、概括的,明线是写郑敏的创作思想如何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暗线是揭示中国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如何接受中西诗学的影响。

从明线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论证独到之处:其一,对郑敏创作思想梳理清晰。作者认为郑敏在1986年以前属于现代主义的创作,主要受里尔克的影响;1986年后基本转向后现代主义,主要受德里达的影响。这一梳理是清晰完整的。在讨论郑敏后现代主义创作思想形成中,从郑敏所受美国当代诗歌的影响和解构主义影响入手,并结合1986年以后郑敏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持之有据、论述周密。其二,作者

对郑敏诗歌前后期创作进行对比研究,并运用西方现代诗学理论去概括总结其不同的审美倾向与社会影响,这是具有较大理论难题的一次有益尝试。因为时间跨越几十年,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对其影响差别极大,这需要研究者具有历史原场敏感度并具有较高的艺术悟性。作者充分考察郑敏后期诗歌对前期的超越,这是需要学理支撑的学术判语。其三,论文充分论证郑敏诗歌受德国诗人里尔克影响,而不是其他论者所说是受英国诗人燕卜生的影响,其论断较为妥帖。郑敏学哲学出身,她对里尔克诗歌有着深刻的哲学感悟,其许多诗作都深深包含着诗人对生命与宇宙的深度体验。论著在这一方面的学术论述,颇有深意和学术价值。

从暗线我们可以看出三点启示:其一,中国新诗百年的发展,虽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看似中断的现象,但总体上看是与西方诗歌呈现同步发展的趋势;其二,中国百年诗歌潮流的发展大致和西方发展趋于一致,但中国诗歌有自己的语言特色,既体现了中国诗歌的民族特征,也体现了中外诗学的互补功能。第三,新诗的发展在当代文化转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研究方法上勇于创新。该著作并不是一般的论述郑敏的诗歌创作,而是以中国新诗的发展为主线,将郑敏的生活、诗歌创作、诗论、翻译结合在一起,并放在20世纪整个新诗的发展背景下,以郑敏为核心,折射20世纪整个新诗发展的历程。这种研究既不同于一般的诗歌作品研究,也不是一般的诗论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颇具代表性。作者吸收了学术界的大量研究成果,

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可谈论文学理论的中与外的关系。我们无论对古代文论还是对外国文论,都应取一个“用”的态度。古代文论在古代是“体”,在今天就不是“体”了,外国文论在这些文论所产生的国家和时代,也曾经是“体”,但对我们就不是“体”了。它们只是“用”,也只能是“用”。因此,还是那句老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具体到外国文论,需要做的,是这样三件事。首先是“拿来主义”。外国文论,还是要“拿来”。鲁迅先生说得好,拿来不是送来。西方送来了鸦片,我们不能要,但不能由于西方送来过鸦片,就把门关起来,拒绝一切来自西方的东西。晚清的那些迂腐的士大夫们就这么做,关门大吉,做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迷梦。更有甚者,还有人一边吸鸦片一边喊关门,结果错过了现代化的历史机缘,误国误民。我们要去拿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过去100多年来,无数的志士仁人,当盗火者,拿来了许多有用的东西,这才有了民族的重生。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再次用“拿来”的态度,促进了文学理论的大发展,也推动了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文学繁荣。

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标准只有一条: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学的创作欣赏的实践,是检验文学理论的标准。回到“皮”与“毛”的关系,文学理论要依附在文学实践之上。外国的理论我们要接触,要研究,这是专门的学问,需要这方面的专家,要熟悉其语言,了解其背景,了解其与所有生长出来的文学实践的关系。我们要有各方面的专门学问家,他们在一道,就构成一个合力,就能使我们了解这个世界。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整体学术实力建设,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在将国外的理论纳入到我们的文学理论体系之中时,就需要选择。选择的标准,是当下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欣赏实践。对于理论,我们不能持教条主义的态度,不能自说自话。在文学理论的会议上,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接地。文学理论要接地,要接上地气。不接地的空头理论,没有前途。

我们需要做的第三件事,就是自主创新。我们听到了太

多的理论终结、美学终结、文学终结、艺术终结,以及形形色色的终结说。这些终结说,不少是大言欺人,故作惊人之语,是叙事策略而已。但是,如果不“接地”,如果不创新,理论终结倒是真有可能。过去的30多年,60多年,90多年,也就是从改革开放起,从新中国成立起,从五四运动起,中国文学有太多的经验需要总结。当前,文学所遇到的种种新情况、新成就、新问题,也需要我们进行分析和介入。更进一步,文学批评中也形成了种种争论,需要理论的思考为其释疑解惑。这些都是理论的素材,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谈到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理论、当代中国美学以及当代中国文化理论时,有这样一种现象,这就是一些中国学者受种种影响,不承认这些成就,特别不相信中国人可以有理论创造。说起理论来,不是外国的,就是古人的。产生这些状况的原因,有“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人之常情,也有长期积累的海外汉学影响。对于一些人来说,不被海外汉学家所承认的中国学者,就不是有成就的学者。而对于海外汉学家来说,长期形成的西方出理论、中国出例证的研究传统,很难一下子根本克服。于是,当代中国人所创造的理论,很难进入到他们的视野之中。他们会不自觉地形成当代中国理论虚无论。这些理论虚无论,又恰好与前面所说的“西化”论者和“中化”论者合流。各种力量构成了一个合力,对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进行围剿。

然而,不管有多少不利的局面,不管面临怎样的围剿,既是当代的又是中国的文学理论,仍是我们所需要的。过去90多年,60多年,30多年,以及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理论家们的一些理论努力,以及他们所获得的成就,需要我们认真的总结。当代纷繁复杂的文学文化现象,中国作家、批评家们所取得的成就,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基础。日渐强大的国家实力和安定的学术环境,也为理论思考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今天,到了既具有当代意义的,同时又是中国式的理论成果的时候了。能不能做出无愧于时代的成就来,这需要我们有攻坚克难的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机遇。

论文中直接“引用”,但它有时会左右我们的情感倾向和思维路线,在意识底层强化了我们问题的认识程度。据我所知,本书的作者在具体研究中,这三种资料收集方式都用了,而我尤其赞赏他在第二种和第三种资料收集中所下的功夫,如果说这本书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的话,第一手材料的发掘功不可没。当然做到什么程度,是见仁见智的事情。重要的是作者在坚持这样做。

五、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首先,该著肯定了郑敏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指出郑敏运用后现代主义思想提出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倡导当代女性诗歌应是超性别写作,主张新诗应是心灵的书写的正确性。同时,作者对郑敏的新保守主义诗学观也持赞同态度。但是,作者也指出郑敏诗歌理论

的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对待西方语言学理论与现代汉语学理论的关系。将西方语言学理论运用于对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重新解读和阐释,的确有创见。可是,这种运用如果不能与现代汉语学理论相结合,其阐释成果多大程度上为现代汉语诗歌写作所吸收和转化,仍然是存在疑问的。二是对待二元对立结构模式的态度。二元对立结构是现代性对现代性思维方式的一种理论发现;没有这一发现作研究参照,后现代性的无中心论、多元结构无从显现。然而,二元对立结构既是现代性思维方式的痼疾(在后现代性看来),也应当视为现代性思想资源的重要部分,是现代性对古典性思想特征的有意识的继承,一味地贬斥它不是历史研究的正确态度。

近百年来对新诗的发展研究,可谓众说纷纭,有些则是截然对立的。这体现了学术发展的常态。我以为对不同的充分表达和自由碰撞,只会有利于学术的发展。青年学人在这一点上,尤其扮演了前卫的角色,这是让人感到欣慰的。本书阐发的上述问题,一定会激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新诗的诗体建设是诗歌界长久以来都在探讨的问题。从字面意思来看,“诗体”侧重于诗歌的形式方面,因此很多观点也是从这一维度提出的。比如国学大家季羡林就曾不无忧伤地说:“新诗至今没有找到它的表现形式。”但我却认为,新诗没有自己统一的表现形式,却是新诗不幸中的万幸。假若刚刚获得解放的新诗即刚刚从格律诗中解放出来的新诗,如果找到了统一的表现形式,岂不是又要给自由了近百年的新诗重新戴上手铐脚镣?重新被束缚起来?正像刚刚废除妇女缠足的恶习之后,再给妇女缠起三寸金莲。因此,新诗即自由诗没有统一的形式,这完全符合提倡写自由诗人的初衷,是合乎自由诗的诗体发展规律的,谁违背这个“自由”的规律,谁想找一个统一的新诗的表现形式,可以说:此路不通。若不然,为什么从闻一多提倡新诗的建筑美、绘画美、音乐美,到现在的一些理论家所提出的新诗要改革,时间已跨80多年,争来争去,至今没有形成一个令人信服的共识呢?

在这里,我不是要完全否定新诗格律化的必要性。实际上,在新诗的创作实践中,各种诗歌探索,只要是出于促进诗歌发展的初心,都非常有必要。但是,如果我们在探讨新诗的诗体建设时,只是一味地单独强调形式的问题,可能会舍本逐末。我认为,新诗体的建设,核心的核心、关键的关键,根本的根本,就是追求诗的意境美。如果舍此而不谈,奢谈诗的形式美、绘画美、诙谐美等等,均是舍本求末的侈谈,必然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何谓诗的意境?有的学者认为,“意”就是情意,就是主观的思想感情;“境”就是境界,就是立体感的艺术图画。在文学作品中,“意”不能赤裸裸地说出,需借物来表现;“境”不能是纯客观的物象,需由意所触发。因此,所谓“意境”,可以说就是诗人的主观思想感情与诗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有机融合而形成的一种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是诗人强烈的感情和生动的客观事物的交融。王国维认为,情与景是意境的两个基本要素,情景交融是意境的基本特点,追求感情的真挚、形象的真实和语言的真切是意境的核心。朱光潜曾说:“每首诗都自成一境界。无论是作者或是读者,在心领神会一首好诗时,都必有一番画面境或是一幕戏景,很新鲜生动地呈现于眼前,使他神魂为之勾摄,若惊若喜,霎时无暇旁顾,仿佛这小天地中有独立自足之乐,此外偌大乾坤宇宙,以及个人生活中一切憎爱悲喜,都像在这霎时间烟消云散去了。”

朱光潜关于诗的境界说,已经把诗的意境及其作用说得极其透彻。我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得出的经验,认为符合朱光潜诗的境界说的意境,应该具备如下三个方面,即三化——氛围化、情节化、意象化。具有这三化的诗,就是具有意境美的诗。氛围化就是指诗中的气氛,是欢乐还是忧伤,是悲壮还是愤怒,是凄凉还是温馨,总之诗人的情绪都在氛围中呈现,它具有诱人的魅力,能抓住读者的心,让读者跟着诗人情绪,步步深入到诗的境界中去。情节化就是指诗的故事性、戏剧性。诗人的思想、意念、志向都体现在情节的秩序里,是诗人引领读者进入境界的巧妙构思。而意象化就是指一首诗的形象,意境的画面感全靠意象的鲜明、准确、到位,没有意象的诗,味同嚼蜡。因此氛围化、情节化、意象化,是构成一首诗的意境美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这三位一体的完美结合就构成一首诗的意境美,有了意境美的诗,就能抓住读者的心,使其走进诗人创造的意境里。

诗的意境就是诗的灵魂。诗的意境美是奠定一首诗成功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他的诗美会应运而生。只要稍加打磨,便纷纷呈现。你要想让诗的形式美——格律化,那就将诗句整齐划一;你想追求音乐美,那就在节奏音韵上下点功夫;你想抒情一些,那就将诗句带上浪漫的色彩;你想哲理一些,那就将诗句打磨得令人思考;你想诗句含蓄一些,那就采用修辞手法暗示;你想诗句诙谐一点,那就不妨借风趣的语言使场景生动起来……但是,如果没有诗的意境,等于丢掉了诗的魂魄。那么,你以上的打磨或雕刻都是徒劳的。没有意境美的诗,无论是旧体诗还是自由诗,再好的形象、再好的音韵、再好的形式,都是空的,都不是诗。

新诗自上世纪20年代脱离旧体诗的束缚,发展到今天,已近百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一些经过大浪淘沙、岁月沉淀之后,依然能打动人心、与史同在的诗篇,都是继承了古典诗词中意境美的诗篇。像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贺敬之的《回延安》、曾卓的《悬崖边的树》、洛夫的《边界望乡》、舒婷的《致橡树》等。这些诗的意境令人过目难忘。

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刚刚走向诗坛的所谓先锋,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反对继承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一律照搬西方诗歌模式,盲目追求诗歌的思想性、哲理性,惟独不要诗的意境美,把诗写成晦涩难懂,味同嚼蜡的理性诗。还有一些人追求所谓语言的本真,把诗写成脱离意境美的非诗性口语叙述,成为令人厌恶的口水诗。理性诗和口水诗都是脱离意境美的伪诗,不可能向读者提供令人愉悦的,暂时脱离世俗烦恼的诗的意境。既然如此,谁愿意去冥思苦想地去读一首理性诗呢?谁愿意去读一首毫无诗味可言的口水诗呢?新诗的边缘化,是诗人自造的恶果,是诗人自己羞辱了自己。

诗歌既然是语言的艺术,就意味着艰辛的创造。不管你是用触景生情还是寓情于景,都需要运用各种修辞方法进行精心打磨,创造优美的诗的意境。它是诗人追求的目标,也是评论诗歌的重要标准。

“中国梦·翰墨缘”展览亮相天津

本报讯 记者从9月17日中国国家画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梦·翰墨缘——中国国家画院、天津画院、江苏省国画院、山东画院、甘肃画院美术作品展”将于9月25日在天津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汇集了5家画院近160位画家的300余件作品,是近年来较少见的几个地区的画院系统艺术家的集中展示。画院体制始于五代盛于北宋,新中国成立以后,画院体制为弘扬和传承中国画传统、推动中国美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作用。

“家国情怀”中国画作品展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珏)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艺术,9月20日至25日,由远阳英明文化艺术中心主办,北京收藏家协会、《中国画报》协办的“家国情怀”中国画作品展在京举行。

此次展览共展出了杜若飞、王林、王佑学、王学礼、邹梦德、陈敬友、马耘、王永芬、李恩成、张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介绍到,这次展览体现了不同地域的书画风格,5家画院在不同地域的文化背景下,呈现出多元的创作取向、独特的文化特性和不同画家表现出的不同个性特征。据悉,天津画院和天津博物馆作为此次展览的承办单位,为5家画院在天津的相聚付出了极大努力,同时为此次展览承担了许多具体工作。江苏省国画院、山东画院、甘肃画院等积极响应,悉心配合,遴选了诸多精品力作参展。(李晚宸)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9月28日至10月5日,国家大剧院版歌剧《洪湖赤卫队》将再度上演。9月18日,在一场特别的探班活动中,众主演与大剧院特别邀请到的5位“洪湖老友”在排练场中相聚。

在这5位“洪湖老友”中,董天姝和蔡希秦是女排国家队的队友。在上世纪60年代,她们每天经历着艰苦的训

练,支撑她们的力量之一就是《洪湖赤卫队》。每次去训练的路上,全队总会一同唱起“洪湖水”,优美的旋律让她们忘了疲惫和伤痛,擦干眼泪汇报祖国。5位洪湖迷与剧中韩英的3位扮演者吴娜、王庆爽、张心萍一起,唱起了那首刻录在几代人记忆中的“洪湖水,浪打浪”,在这动人旋律背后透出的,是那永远不会被忘却的赤诚情怀。

专家关注在线教育发展

本报讯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慕课(MOOC)”渐渐成为一种引人注意的新兴教育方式,这种零门槛、大规模的网络开放课程,不仅克服了学习者的时空限制,更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料。日前,腾讯思享会邀请汤敏、尚俊杰、姬十三一起探讨数字时代的大学和在线教育的发展。

汤敏认为,对于大学教育来说,最大的限制不是物理上的,而是要看有没有好的老师和优质的教育,互联网教育可以打破知识传播的“围墙”,也有利于突破思想的限制。他认为,中国慕课的发展应该致力于解决三个问题:解决教育公平问题、解决大学生就业问

清华大学举办“宗教与艺术”人文对话

本报讯 宗教与艺术是人类文化历史的核心内容之一。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宗教与艺术都蕴含了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并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在中国,这二者之间更是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关系。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这种人文特质该如何进行传承和变革?近日,由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的“高端人文对话系列之‘宗教与艺术’专场在京举行。潘公凯、汪晖、沈卫荣等围绕该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对话活动中,几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对宗

教和艺术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并就宗教与艺术的内涵、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人文精神的体验与实践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内容丰富多彩。此次活动吸引了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的300多名师生参与。主办方表示,举办人文对话系列活动,就是在跨学科、跨文化背景的交流碰撞中,激发一些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为学术探究和文化构建提供一种多角度、多层面的参考。(清 文)

蓝疆同志逝世

星星诗刊编辑部主任蓝疆同志,于2014年9月16日因病逝世,享年85岁。蓝疆,原名兰万伦。中共党员。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烟花三月》《逆流》等。

沈泽宜同志逝世

湖州师范学院教授沈泽宜同志,因病于2014年9月21日逝世,享年81岁。沈泽宜,笔名梦洲。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的真实世界》《梦洲诗论》《〈诗经〉新解》等。

新诗的诗体建设

□董培伦

(行 起)